

THE POSTCOLONIAL FEMINE SITUATION: LANGUAGE, TRANSLATION AND DESIRE



語文、翻譯和欲望

後殖民的陰性情境

Chun-Kit Chung
張君玖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後殖民的陰性情境：語文、翻譯和欲望 / 張君玖著

— 1 版，— 台北市：群學，2012.03

面；公分

含參考書目

ISBN：978-986-6525-52-0

1. 文化研究 2. 社會學理論 3. 文集

541.207

101003238

後殖民的陰性情境：語文、翻譯和欲望

著者：張君玖

總編輯：劉鈐佑

編輯：王章中

發行人：劉鈐佑

出版者：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61號7樓712室

電話：02-23702123

傳真：02-23702232

Email：socialsp@seed.net.tw

網址：http://socio.com.tw

封面設計：井十二設計研究室

電話：02-29520672

印刷：權森印刷事業社

電話：02-35012739

ISBN：978-986-6525-52-0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定價：360 元

2012 年 3 月

一版一印

目錄

序	張君玫教授走出的一條路	孫中興	1
序	迎接一個「陰性」閱讀的邀請與教習	丘延亮	5
序	期待張君玫，小心張君玫！	鄭志成	13
致謝			23
導論			27
第一章	世界主義作為分子化翻譯的效應		35
第二章	分子化翻譯和語文現代性——德希達、魯迅、班雅明		99
第三章	漢字改革的演化意識以及黑格爾式的拼音偏見		151
第四章	女人的地方與倫理——全球女性主義和發言倫理		213
第五章	「空缺主體」與「陰性情境」——重探台灣後殖民		253
參考書目			305
索引			335

序 張君玫教授走出的一條路

孫中興

張君玫教授將她最近寫的論文加以整理成一本書，特別希望我替她寫一篇序。她像以往一樣，沒多說甚麼，我也就沒多問，一口答應下來。我想理由應該很簡單，因為過去我指導過她的碩士論文，到現在她還願意尊稱我「老師」，而且多年來也常相問，所以本著「一日為師，終身服務」的新「師生倫理」，我是沒有理由推辭的。此外，她多年來對於理論的專注和我教社會學理論多年，就算基於「同業的禮貌」，我也不該拒絕。

我一直沒有閱讀同行論文的習慣。出道早年曾經應邀匿名審查過同行投稿學術期刊或升等論文，但都覺得自己的對於論文的標準看法和別人差異太多，我花費時間和誠意的批評，搞不好還會被認為是「在暗巷被人蓋布袋亂打一通」。在學術研討會上，我也因為名列「資深同行」之故，而有幸受邀擔任過評論人，可是我總覺得時間太短，無法暢所欲言，對方是否能從我的評論中受益，則是我一直耿耿於懷而且無從得知的遺憾。所以後來我就都推辭擔任類似的審查和評論工作。當

然，這其中也夾雜著自己剛出道時，自己從匿名論文審查意見中所獲得「幾近找麻煩」而讓我至今都還有怨氣的往事。所以，我雖然沒有拒絕，但是心中對於我能寫些甚麼還是有著遲疑。

收到出版社寄來的書稿之後，我先稍微翻了翻，發現君玫已經在一開頭就把自己文章的意思說得清楚明白，完全不需要我來浪費筆墨。我只就自己能力所及，略述一下自己的「讀書心得」，比較像「書評」，絕對稱不上是「序」。

我習慣從章節安排上先了解全書的架構。如果從內容來看，這本書的前三章集中在和語文和翻譯有關主題，後兩章又各自獨立。換個角度看，這本書其實在談幾場「論戰」，也可以說是對於語文、性別和國族幾方面「現代性」所衍生出來的議題。

另外一個考察的重點就是這本論文集所引用到的理論和概念。書中出現了許多被歸類在「後現代主義」、「全球化女性主義」，以及「後殖民理論」的人物以及他們的概念，對於當代社會理論有興趣的讀者，應該可以從本書中得到很好的回饋。如果以學科畛域來區分，這些都是當今以外／英文系為主的「文化研究」比較常接觸的理論資源，對於社會學理論界相對上都是比較陌生的。君玫在書中已經對這些概念做了解說，但是這對許多社會學為業的讀者恐怕還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對我個人來說，這本書雖還不致於是「思想上的珠穆朗瑪峰」，但也堪稱是「閱讀上的玉山頂峰」吧！有些我可以輕鬆從中受惠，有些我則不太敢苟同，還有些則顯然需要我（或是君玫）更多

的努力才行。這裡我就不得不倚老賣老提到過往的經驗。我在某次討論「中國現代性」的歷史學界的學術研討會場合提過，以「如果我們在論文中把「現代性」去掉的話，是否會妨礙我們對論文主旨的悟／誤解」，當成是該概念或理論有無必要性的判準，不過除了惹來大家訕笑一陣之外，好像我自己的判準反而成了沒有必要的存在。後來還有人稱我為「後現代主義者」，讓我這個恐怕都還沒進入現代的人完全不知道該如何回應。我會用我比較熟悉的知識社會學或是其他簡單的概念，來看待這本書處理的幾件例證上，譬如說：用「沙皮爾和吾爾夫假設」(Sapir-Whorf Hypothesis)的這種「語言相對論」來看待語文和翻譯的問題，以及用「政治權力」的觀點來解釋台灣「漢語拼音」和「通用拼音」的爭議問題。我也會從年齡的區隔來看待「全球化時代」下現代台灣現存的「婆媳問題」。

比較容易了解的是她舉出的文本證據部份。這一點她已經超越了一般社會學理論家「只談抽象概念，不提具體事證」的學術慣行。不過，我覺得前三章對於語文和翻譯的部份，因為和一般讀者的生活經驗比較貼近，所以容易了解。第四章的「全球女性主義」部份，雖然外國人名和理論探討多於具體事證，但終究還是個容易從自身經驗反思的現象。比較抽象的恐怕就是第五章所提到的那場論戰。對於大多數讀者來說，這種「高來高去」「以外國理論來戰外國理論戰」的論戰，充其量只是「茶壺中的風暴」，或更確切地說，是外文系或《中外文學》幾位同仁的「同室操戈」而已，於社會大眾的影響恐怕是無法和語文問題相比的。

讀者應該也知道，這不是一本導論型的書，而是一位年輕的社會學者結合理論和歷史和現狀的努力成果。這應該是這本書最好的定位。

君玫從以前當學生時代，就是好學深思，奮力不懈的人。過去她翻譯了無數的專業書籍，現在終於開始走出了一條自己的學術道路，我一路看著這位「理論旅人」的成長軌跡，特別感到欽佩和讚許，當然也期待和深信她未來會有更多的心得發表。

不管學術的森林中有幾條路，至少已經走出了一條張君玫的路。

（作者現為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序 迎接一個「陰性」閱讀的邀請與教習

丘延亮

暑假前，君玫邀我為她的新書《後殖民的陰性情境》寫序，她的文字我雖不陌生；除了一系列異樣認真的翻譯實踐外，學術論文我大多已拜讀。但這次假期中有機會系統性的把五篇論文一口氣讀下來，覺得甚有咬勁，需要細嚼；受益良多，果有不同。

我印象中最突出的是，這五篇看似分立的篇章，寫作、出版的時、地皆不相同；但如今一旦集起，眉目則更加清晰；幾有呵成一氣之勢。其指涉雖有先後，成集並未曾斧鑿畢露地再予構築或包裝；但，識者知之，其論旨是連貫的；選題也是肌理明晰及內裡關聯的；這點是我首先要向她恭禧並向讀者強調的第一樁事。

其次，我甚為慶幸的是，在閱讀過程中我經驗的重積感（intensity）和緊密性（engagement），是中文著作中少有的。作者對她的對話者（interlocutor）是蠻苛求（demanding）的；被邀請下場

的對手是無法不出汗的。而我的經驗是，對壘後能感到一種抒發及釋放，過程辛勞，結果愉快。

當然，我的遊刃有餘並不完全是由於君玫五篇論文中的主要對話者都是我的熟人——不是戰友就是論敵——；也不是由於她的交鋒果然劍及履及，即場到位……主要是她本身也密著在（engaged）真切的認知論詰，以及現實運動與政勢（politics）的授意踐行（signification practices）之身體勞作當中。

具實地說，這種身體勞動中的自我生成（becoming）和蛻化（transformation）是不可取代，也是無法由他人越俎代庖的；要不是過去那麼用力地「硬／軟」譯、「直／曲」譯，甚至「意／死」譯了那麼多東西，君玫的解構及省思就會變成不是無由來自、就是無的放矢的東西。相反的，有踐行實在性的思考卻不能不是從身體力行的「身體經驗」中沉澱下來的，在積鬱重壓下促生的、返身與再思——不是什麼理論的「必然」，或是先驗的「證成」！

同理，不是自四十多年前就不自量力的「直／曲」譯、「硬／軟」譯，「意／死」譯迄今——我最近十年努力翻譯阿席斯·南地（Ashis Nandy），到今天也還只能自認是初譯，或「試譯」——我想我也不會對君玫的陳述、理解與論詰有那麼切身的體會，真可謂是「翻譯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了！

作為一個台灣訓練、留學美國的「歸國學人」的君玫，能有今日的進程，誠然是鼓舞人心的；

我禁不住自語：道之不孤，豈無鄰乎！

然而，就在這學風矯偽、士氣日下的環境中；在一個人文社會論詰仍深陷於五、六○年代「實證」迷思，以及其一○一教科書之語境中的台灣，我們要用「能懂」的語言表達或授意就不只是「戰略」的抉擇——或是、更多時候的、無可抉擇——或考量了。

一方面既不欲，亦不能像陳光興一樣執意（且笨拙地）把某些論詰物化為「方法」來出場；另一方面也不夠高態勢及靈巧地如史碧華克（Spivak）溫婉地稱其 politics 為「教習」（pedagogy），換到是我自己——且容在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一定不免會鎖入（lock-on）戰術（tactic, *à la de Certeau*）的層次；藉演敘（narrativization）來進行顛覆與倒置。把 misplaced 的 concreteness 倒轉過來，也把習然不察（take it for granted）的 abstractness，給 dislocate / displace 掉。這就是在幹「翻譯」的時候，一再遇到非「翻」不可的情境；這個「翻」不正是蔡元培在序魯迅全集時所稱的「借他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的勾當嗎？

也就是在這個理脈（context）和踐行（praxis）的層面上，我試圖就君玖的「molecular 翻譯」進行「制造感知」（make-sense）、戮力理解（understanding）。

但，在 make sense 的同時，我發現我會更基進：如 catagoresis 一詞，我就不會把它譯成「詞語誤用」，因為我主張詞語之「用」是沒有不誤的。是故，我曾將它試譯為「『訛』轉」，意指即

使是 transliteration「音譯」，它也可以由產生的訛音至於產生「衍意化」。其中最有趣的歷史神話，莫如把 Tagasago 寫成日文漢字的「高砂族」，它復被華語學者們「更正」成為「高山族」的例子。

然而，我贊成「molecular」這個「隱／換／譬（可以是任何冠詞）喻」——或更精確地說「衍意」（connotation）——的地方也恰是我對之有意見的地方。

我的異議有點吹毛求疵：這個 figurative 的想像有它的 figure 嗎？如有，那 figure 是什麼？

之所以這麼問，因為我認為 molecular 是不能被 figure 的，是故，以 molecular 為主的想像可能是太具實了；直言之，我疑心它未足夠地擺脫「物理／物象」的巢臼，是故可能是有害的（counter-productive）的。

我之所以這麼辯說（argue），是質疑分子生物學中的所謂「分子」作為「授意品」（signifier，或比較拖泥帶水一點稱之為「意符」）的性質，它（們）似乎是被用來指認（denote）和它們相應（或有待「實證」的）「東西」；果然，它是一個 signal，不是一個 sign——是只能被認識，不能被理解的。

猶有甚者，以吾人迄今僅有的知識言，我會認為 gene-code 的辨認，頂多只是在語言系統中辨識字母（alphabet）的層次和階段……——我們知道 alphabet 既不是字，也不是詞，更不是句……它不構成可以被用來通過 signification 過程來連接 signify 和「signified」（承意品）的概念工

具：它既不是可以用以進行「替現」（represent）的「理識原件」（episteme），就不能是被用來 signify 「signified」的授意品（signifier）——它當然更不能在語音、語意、語用……等「系統」的多重法則（如文法、語法、詞法……）中存有和作用了。

換言之，語言的成品及思想的成品可以（也必然）無窮地被 articulate、de-articulate 和 re-articulate——用君玖的話，可被切割、轉化、融合、重組，也可被「挪用」與「雜揉」。之所以然者，恰恰由於 signification practice 的過程性與能動性，更由於 signifier 及 signified 兩造之間的無窮 arbitrary 可能性，及雙造各自滿溢（overflow）的可能與性質。它在 parole（真實使用時的語言）中，永遠是一個 re-creation 的過程，也只有授／受者在共同 create 和 re-create 的狀態和過程中，兩造才能「溝通」、「同理」，或「瞭解」。

這個過程既是一個「假」、「借」、「轉」、「仿」（mock）的過程，更是一個「猜」、「臆」、

「授意品」與「承意品」的譯法是跟從了朱光潛的翻譯「直覺品」和「表現品」等辭而來的（見《朱光潛全集》第十一卷，朱澤克羅齊原著《美學原理》，第一三二頁；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五月，第一版）。

朱光潛在第132頁註一中說明：「把直覺的活動叫做『直覺』；直覺的產品叫做『直覺品』。『表現』與『表現品』以此類推。這就如寫文章叫『作』，寫成的叫做『作品』。」；同理，「授意品」是授意活動的產品；「承意品」是承意活動的產品。至於「授意」的「授」這個概念則來自「授時制度」——時間是沒有的，是要經過授時這個活動（或儀式）由人授予的；在王朝時代是為皇帝的專屬職權——至於被授時候的「正曆」，則是承接「授時」活動的產品，也就是一定時代的「承時品」了！

「瞰」、「套」的過程……一個由種種這些動作糾纏下的「制造感知」(make sense)的過程——它的動理在在把我們帶回到基本的語意原理：任何「representation」(with or without reported speech)都只能是一個以非它之「其他」進行的替代；語言的 representation 只能是「替現」！

此理既明，上百年的「體」、「用」之謬也就清楚了；「天下本無『體』，何『用』惹塵埃！」

然而，這個「體」是否乃一個絕對「沒有」(尤其是 discursively speaking)的東西呢？吃錯了東西會吐，看／聽到噁心音像也不免反胃，不是嗎？這個「吐」、「反胃」感知的「subject」又是個什麼東西呢？這個「subject」(à la Lacan)又是怎麼被言語替現——甚至到「實體化」的程度——的東西呢？——它又如何與其他「subject」有時不可共相(incommensurable)，有時又成了「縫合了的」(sutured)的存有呢？

當然，「subject」的一切可能都不是先驗的，更不是本質的，是後天的、被建構的，更是在一定的史境下被宰制著、複製著及控制著的。

如君玖曾不只一次引用的沃洛辛諾夫(V. N. Volosinov)的主張：signification practices 是意識形態性的行為；是一個透過授意踐行的鬥爭來折射現實的場域和過程——如此看來，魯迅對「硬／軟」譯、「直／曲」譯……「意／死譯」等操作的反省，即是對這樣過程通透肯識的表達；比起其他蛋頭的迂腐障眼政勢，魯迅的揭露與將它問題化是絕對必要的、值得歡迎的——是一種反對掩

蔽問題的政治實踐和態度。

當然，從魯迅到史碧華克；自拉克勞（Ernesto Laclau）到巴特勒（Judith Butler），透過沃洛辛諾夫讀入哈洛威（Donna Haraway），要 articulate（或 re-articulate）他們，跨度是相當大的；台灣政壇及運動圈在過往二、三十年來中發明了一個叫「主體」的東西；這個東西很難用現成的名詞予以替現——西方的 *subject* 一詞顯有不逮——揆之現實，它在實施上具體化的卻是「本質主義」性的「名份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其極端的程度至於自我構陷到成為殘人自殘卡通的地步。

在這大氣候下，一個非國族（non-national）、祛雄邁（de-masculined）、抵制陽剛掛帥、否證單一自身的「破殖民」（post-colonial）情境，是個什麼環境呢？其中的發言及踐行又何以能在主渠（mainstream）言路的多重宰制（over-hegemonization）下不至於失聲呢？

君政本書戮力於其中，對如此處遇試圖進行的「陰性情境」書寫，相形之下，更是有突圍的創發性意義了。這個比「雌性」更深廣的「陰」性意象，當然有必要進一步加以伸展；以擴充其多重自身的肢體、想像與空間——它召喚了月娘（luna）、子宮、大地、母親、闕如、空無……甚至於 Prometheus 的負像雙生兄弟 Epimetheus（ref. Amis, Les 2009 *Commemorating Epimetheus*）的眼神，回眸和我們對視。它更提點了我們：雄邁之姿雖層層蒸發出陽剛的頤氣，陰柔的行事卻絕不意味了只有雌伏與屈從的默受或自語。

近二十年來，台灣特色的性／別論述之自耽（陷）在「認同」（其實是「名份」）政治的漩渦中浮沉，它一再地雄邁化了它的論詰與論場，竟至於自覺或不自覺地持「體」自「用」，不但在青年從眾身上產生了唯「性／慾」掛帥的旨向，還將之幻為政治正確訴求。

相對而言，一個真正的「陰性」情境的論域及文化場，則不得不挑戰了吾人對 sexuality 的授意與感知——在眼見到它「性／慾」質的身體性的同時，也要求我人有能力同理於它「興／育」質的貼身性與在床性（embeddedness），要求我們有能力更如實的對「興／育」質進行尋繹與解構。果然，我們當知道互為主體與相互為用是有可能的政勢，認異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中的「興」與「育」的解放也不是無的放矢的東西。

就是在這些點上，我感念君玫的勞動，及她俾予了我們一個「陰性」閱讀的空間與憑藉。

（作者現為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序 期待張君玫 vs. 小心張君玫！

——做爲抵抗與出路的陰性書寫

鄭志成

「……殖民地缺乏超越例行公事的精神力量，並且……它缺乏這種能量，因爲它不夠相信自己……它設定的完美之地不在自身的現在，也不在自身的過去或未來，而是在它邊界之外的地方，超出它自身的可能……藝術的孕育產生，是由於藝術家及觀眾共同擁有一份熱切又獨特的興趣，對存在於他們所處之國家的那種生活感興趣。」—— E. K. Brown, *The*

Problem of a Canadian Literature, 1943

我與張君玫是有距離的。這一段距離不只是東吳和東海的距離，也是德希達（Derrida）與康德（Kant）的距離，更是後殖民之女史碧華克（Spivak）與西方文明之子韋伯（Weber）的距離，是地方性思維與世界性心靈的距離。但是——距離正好觀看，有距離才能遇見。